

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英〕拉什等著 征庚圣，
袁志田 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栽藻秣壯齒燥齋理藝畢藁忒藝職齋

陽昇苑原豐原原超級員原緣

I 阻碍援 II ①拉援②征援③袁援 III 搬本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阻援②袁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读数据核字(圆园)第 圆园园园号

书 名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著者 [英] 斯科特·拉什 约翰·厄里

译者 征庚圣 袁志田 等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刘沁秋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59 号) 邮发 21

网 址 <http://www.163.com>

漢書 韓彭曾呂 通鑑 京 曾 堅 出 釋 史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连云港海师印刷厂

开 本 愿图尹贡源毫米 员猿

印 张 员 缘 插页 圆

字 数 猿四千字

版 次 二〇〇五年 九月第 一版,二〇〇五年 九月第 一 次印刷

标准书号 陽 景 苑 一 園 源 一 園 韻 一 緣 鄴 怨 苑

定 价 圆 肆 拾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鸣 谢

作者和出版者对下列单位同意引用以下文章表示感谢：

砸 阿米扎德《阶级、政治和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

贸易和工业部《1910-1919年生产调查的历史记录》，贸易和工业部商业统计办公室，伦敦，1951年。

杂福瑟吉尔和 鄢 古金《不规则的增长》，高尔出版集团，奥尔德肖特，1951年。

蕴赫希霍恩《超越机械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1年。

宰·科皮《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劳特利特和基根·保罗出版社，伦敦，1951年。

宰·科皮《民主的阶级斗争》，劳特利特和基根·保罗出版社，伦敦，1951年。

月砸米切尔《1910-1919年欧洲历史统计》，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和贝辛斯托克，1951年。

阅佩里和 粤沃特金斯《阳光地带城市的崛起》（修订本），塞奇出版社，贝弗利希尔斯，1951年。

阅佩特齐勒、宰·埃布尔豪泽和 粤福斯特《社会历史手册Ⅲ》，悦匀贝克出版社，慕尼黑，1951年。

酝皮奥里和 悦萨贝尔《第二次工业划分》，基础书籍出版

社 纽约 1980年。

允罗斯《撒切尔和她的朋友们》,普卢托出版社 伦敦 1988年。

月萨尔维克和 隔克鲁《不联合的十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 1988年。

孕泰勒和 晕思里夫特《跨国公司的地理学》(修订本),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 1988年。

云蒂普顿《19世纪德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变化》,卫斯理大学出版社 康涅狄格 1982年。

前 言

我们非常感谢许多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本书的历史和比较性质使我们特别依赖许多地方的众多学者的协助和鼓励。所有下述人员都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忠告、帮助、评论或鼓励：尼克·阿伯克龙比、本特·亚伯拉罕森、保罗·巴古利、菲利普·库克、西蒙·邓肯、迈克·费瑟斯通、马茨·弗兰岑、安东尼·吉登斯、德里克·格力戈里、乌尔夫·希梅尔斯特立德、戴维·基布尔、吉姆·凯梅尼、安德斯·谢尔伯格、奥利维尔·孔切德、简·马克·劳森、布赖恩·郎赫斯特、克劳斯·奥菲、迈克·萨维奇、丹·皮罗、沃尔夫冈·斯特罗克、戈兰·西博恩、罗尔夫·托斯滕德尔、西尔维亚·沃尔比、艾伦·沃德、萨姆·惠姆斯特、安妮·威茨。

我们也高兴地向给此项目提供资助的兰开夏大学研究基金会、瑞典学院、纳菲尔德基金会和在伦敦的社会学院致谢。

我们非常感谢梅维·康诺利、凯·罗伯茨和克里斯·奎因对手稿出色的打印工作。

作 者

1987年 猿月于兰开夏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员)
第二章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员)	(圆)
德国：“理想的类型”？	(圆)
瑞典：从金融资本到社会民主	(猿)
英国：中间人经济	(缘)
第三章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圆)	(苑)
法国：因“经济早熟”而错位	(苑)
美国：工具主义和进步党主义	(怨)
一些跨国家的结论	(员)
第四章 经济变化和空间重组(员)	(员)
英国	(员)
美国	(员)
第五章 经济变化和空间重组(圆)	(员)
法国	(员)
德国	(员)
瑞典	(员)
第六章 服务阶级：产生及其影响	(圆)
美国服务阶级	(圆)

英国服务阶级	(四四四)
德国服务阶级	(四四四)
瑞典服务阶级	(四四四)
法国服务阶级	(四四四)
结论	(四四四)
第七章 工业、金融、政治 非组织化的模式	(四四四)
工业变化	(四四四)
银行和金融	(四四四)
政治变化	(四四四)
第八章 工会运动结构变化 新社团主义的终结？	(四四四)
瑞典 集中议价模式的危机	(四四四)
西德 共同决策与非组织化	(四四四)
法国 排斥劳动者	(四四四)
英国 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四四四)
结论	(四四四)
第九章 后现代文化和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结论	(四四四)
后现代主义者感受性的社会基础	(四四四)
资本主义非组织化和政治	(四四四)
译者后记	(四四四)

第一章 导 论

《共产党宣言》通常被认为对资本主义充满敌意。但在其精彩的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

因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动与人们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生活的组织方式尤为相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了节约大量的劳动时间,当生产发生变革时,人们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就会随之发生转变,因为:

资本主义已经“无情地撕碎了束缚人类服从于其‘自然主宰’的杂乱的封建纽带”。

“不断扩张市场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进行追逐,摧毁了当地的和区域性市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一卷,第100页。

“非常便利的通讯手段吸引所有……民族进入文明(对于“文明”,我们解读为“现代性”)。”

“庞大的城市不断出现;把相当多的人口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独立的、松散联合的地方”归并到一起形成一个国家时”就产生了政治集权。

“大量“组织得像士兵”的劳动者“涌入工厂”,无产者“以更大的规模集中”。

“工会的发展“借助于现代工业产生的、使得不同地方的工人能够相互联系的通讯手段”的提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分析家。事实上,他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深入革命的阶级,推动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的发生,产生了超过以往所有世纪所能达到的令人惊异的和复杂的生产力。人们的生活因而为一个变革的资产阶级——一个对变革、危机和混乱有着既得利益的阶级所控制。现代市民必须学习不再怀旧地渴望过去那种“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不管那种关系是真实的还是幻想出来的,而要学习在变动中快乐,在更新中成长,在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中期待将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世界,它已经完全失控,极具危害性和破坏性。因而资产阶级是在一个十分悲壮的范围中运动的。它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既是建设性的也是破坏性的,既解决冲突又产生冲突。在这个不可控制的大漩涡中,人们生活的时空结构不断转变。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就是预言了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成为大约自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社会的特征。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他们所描述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在某些社会中已部分走向终结,最近出

现的一系列不加夸张的重大转变,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步非组织化。这些转变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转变,以及经济和文化转变。这些转变打破和扰乱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宣言中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即使是以零星和参差不齐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纪元,我们不仅反对正统的框框,而且也反对大量经过深思的社会科学观点。我们并非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学派中的教条主义者发难,而是对一些利用这两个传统的更有创造力和更深思熟虑的文化贩卖者提出质疑。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学派通常都坚信我们生活在不断组织化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将提到“垄断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日益集中,辅之以货币资本集中的单一性趋势;他们也将提到“金融资本主义”,其最显著的标志为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相互渗透。他们可能会谈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在它们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低增长和低利润的阶段得以通过国家经济补贴和公共部门规模的增长而抵消。与此相类似,韦伯派人士也声称现代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同存在的国家政府机制的目的论的虚假增长,以及我们所有的机构——包括学校、警察机关、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等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合理化。他们认为,进一步组织化的进程是世俗化过程中较为明显的一面。在这一进程中,对内部限制的解除不断地为标准化、个性化和对外部限制的整顿所取代。然而,我们在这本书中冒着与某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学派的观点格格不入的风险,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一个非组织化过程的论点。

我们必须从阐明我们的术语开始。“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观念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希尔弗汀(亨利·詹姆斯),此后,尤根·科卡(詹姆斯·科卡)和几位其他现代历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发展。对这些作者来说,作为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康德拉捷夫长波^①下行阶段的结果,大多数国家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开始于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科卡概括性的系统阐述中,组织化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相互联系的特性:

因为市场不断地规范,而造成的工业、银行业和商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与此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生产资料行业的特别增长;银行和工业相互关联程度的日益增长以及卡特尔的激增。

随着控制权的科层化和复杂的管理层的等级化,控制权与所有权日益(显著的)相互分离。

由管理科技技术方面的知识阶层和政府中雇用中产阶级构成的新部门的增长。

劳动力市场中集体组织的增长,特别是区域性的工会以及全国性的工会和雇主协会、全国性同业联盟等的增长。

国家和大的垄断企业相互之间不断结合;在集体组织与国家之间,后者对社会冲突所进行的干预日益增加;以及阶级特定的福利国家立法的进展。

帝国的扩张和对海外市场和生产的控制。

政治和国家的变化,它包括国家官僚机构数量及规模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种社会部门被集合到全国性的政治舞台;在国家中和通过国家不断地体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利益;行政管理从仅仅是“维持秩序”向实现各种目的和国家目标转变。

^① 康德拉捷夫长波为经济周期的一种,时间为 19 年。——译者注

愿关于技术合理性的地位和对科技的推崇等在内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变化。

对科卡所列举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特性 ,我们将再添加如下更进一步的特性 :

愿产业资本主义关系的集中 ,只存在于相当少的工业部门和少数几个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中。

愿作为主导部门的冶炼 制造业的发展与它们雇用了数量相对较大的工人有关。

愿不同的产业集中在不同的区域 ,因而明显地存在着可以确认的、建立在少数几个有关键影响的冶炼 制造企业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

愿由规模经济对每个生产单位内部的增长和扩张的决定权所造成的大多数工厂雇用人数的增长。

愿通过对集中服务(特别是商业和金融业)的规定 ,在特定区域占支配地位的大型工业城市实现了增长 ,其重要性也得以提高。

愿有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构造被称之为“现代主义” ,它一方面是指科卡前面所提及的第 愿点 ,另一方面则与这种完全接受合理性和科学方法 ,特别是审美的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对立。

很显然 ,这些发展并不是同时 ,或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所有西方国家的。为了考察在德国、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不同的发展 ,有必要对“ 顶层组织 ”和“ 底层组织 ”加以区分。举例来说 ,这里顶层组织包括产业的集中 ,银行业、工业和国家相互结合的增长 ,以及卡特尔的形成 ;底层组织则包括全国工会主体的发展 ,工人阶级政党和福利国家。关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德国资本主义早在 愿 愿年间就已经实现了顶层和底层的组织

化 ;美国资本主义的顶层组织化开始得相当早 ,但其底层组织化出现较晚且为时短暂 ;瑞典资本主义直到两次大战期间才实现了顶层和底层的充分组织化 ;法国资本主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才实现了顶层和底层的充分组织化 ;英国的顶层组织化开始得相当迟 ,而其底层组织化出现的时间却相对较早。

我们坚持认为 ,有三个因素决定资本主义组织化的时间选择和程度 :首先是这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历史时点。考虑到细节修正 ,一个国家进入“ 起飞 ”阶段越早 ,资本主义组织化须做的必要变更就会越少。这是因为开始工业化较晚的国家需要在更高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层次上与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进行竞争。第二 ,资本主义前组织在资本主义时期幸存下来的范围。英国和德国较之法国和美国更早形成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因为前两个国家并未经历一场“ 资产阶级革命 ” ,因此其行会组织、地方自治政府、商人、世袭贵族、大学和教会团体相对而言未受到触动。有趣的是 ,瑞典居于中间地位 ,这是因为尽管瑞典在封建主义时期国家高度集权 ,但社团组织未能取得同样兴旺的发展。第三个因素是国家的大小。对于要在国际上竞争的小国工业来说 ,其资源必须被引导到数量相对较少的企业和部门 ,因此国家和工业之间的协调 ,即使不是十分必要 ,也将被大大推进。与此同时 ,在那些企业和各种部门相对较少的地方趋于存在更密集的工会 ,以及更多的劳动力组织。

顺着同样的 原点 ,我们现在将阐述“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的含义 :

伴随着工业、银行业和商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张 ,意味着一国市场中被该国的国有公司所控制部分的减少。从国家市场的角度来看 ,实际的资本分散化始终存在。这种趋势以卡特尔的几乎普遍衰落作补充。这种分散化

因关税的总体下降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大公司增加外部活动规模的鼓励而受到促进。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银行业和工业之间的日益分离。

白领工人数量和特定的服务阶级(经理人员、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科学家等)的持续增长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也是现代资本主义非组织化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鼓励个人成就和灵活性的以教育为基础的阶层体系和不断吸引人们注意力并使人们远离阶级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等)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经济中的工业生产能力被削减时,核心工人阶级(即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都减少了。

劳资关系中国家级集体议价过程重要性和效果的下降,以及公司和企业一级议价的增长与从泰勒制到工作组织灵活形式的一个重要转变相伴出现。

摆脱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直接控制和规定后,大垄断组织的独立性不断增长;以工资议价、计划等等新社团主义形式出现的国家规定大部分崩溃了,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增长(试与财政危机等相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福利国家立法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方针对中央集权制福利国家的挑战。

资本主义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导致了冶炼、制造等许多基础行业(如钢、煤、石油、重工业、汽车)的竞争日益加剧,以及部分第一世界无产阶级的工作被转移到国外,这反过来使第一世界经济的工业、职业结构向“服务性”产业和职业转移。

政党的特性和阶级属性的减弱。十分明显的选举阶级性的下降以及“包容一切”的党派的更普遍的增长反映了国家政

党仅代表阶级利益程度的下降。

愿文化分裂和多元主义的增长 ,起因于自 20 年代以来休闲方式的改变和新的文化政治形式的发展。对一些现行文化形式的阐释 ,相关时空距离感的减少(试与地球村相比较)同样削弱了本不成为问题的国家主体的建立。

愿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民族国家数量相当大的扩充 ,以及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组织化部门数量的大规模膨胀。

愿对现代资本主义组织而言 ,随着冶炼 制造业雇用人数绝对和相对的下降 ,这些部门的重要性也下降了。服务业对于社会关系的形成(较小的工厂、更灵活的劳动过程、妇女在某地或某种职业中占多数的运动的兴起、更高的“智力”成分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愿劳动空间分工新形式的相互交叉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区域内的工业集中。由少数几个有关键影响力的冶炼 制造业构成或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区域经济”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不复存在。

愿工厂的平均规模因工业结构的转移、大量节省劳动力的资本投资、各类分包合同活动与大公司的分离、将劳动密集性的活动输出到第三世界“世界市场工厂”和第一世界的“乡村”场所等等而变小了。

愿工业城市的规模减小 ,在区域中的支配地位也下降了。这体现于所谓的“内城”工业和人口的急剧减少 ;小城镇(更通俗的称谓是半农村区域)人口的增长 ;从较古老的工业区域中迁移等等。城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是被卷入资本循环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为供选择的劳动力蓄水池。

愿后现代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的出现和大量传

播。这对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每天日常生活的符号和话语都产生了影响。

本书的主要部分将致力于论证上述“非组织化论点”。要这样做,我们将从五个国家最近的经历中引用大量证据:英国和法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美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在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最多的社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国家。这将导致本书的第二个中心论题——“对比论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资本主义的组织化范围越广,其资本主义非组织化就将更慢、更迟缓。我们认为,在这五个国家中都存在非组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英国和美国始于 18 世纪;法国始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始于 19 世纪;瑞典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本书的目的不单是收集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这两个论点,而且将对它们进行阐述。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支持“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论点,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刻画每个社会如何从组织化转向非组织化的过程。对这种叙述结构的安排部分是通过观察在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及非组织化状况进行的。在这里,理想——典型的国家模式——我们将在文中详细阐述与该模式不同的其他模式——如下:到 18 世纪末,资本的集中导致了经济的组织化,市民社会的阶级组织化和利益组织化则紧随其后;国家组织化进行得相当迟,这一进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较为典型。经济变化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对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职业结构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后来市民社会非组织化的前提。劳工运动内外部利益集团的增多和分裂是市民社会在国家范围内非组织化的前提。市民社会的非组织化本身是国家非组织化的前提,在理想——典型模式中,能说明国家非组织化的例子包括新社团主义的衰落,以及“无所不包”的政党的发展和阶级的不

联合等。

我们也应该强调,这里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与其他作者所说的基于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与后工业评论家不同,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将继续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非组织化纪元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纪元中,资产阶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当我们指出职业—管理阶层或“服务”阶级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时,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特性对资本积累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它确实对资本积累起着平衡的作用。进一步说,我们完全不赞成与像安德烈·高尔兹(~~亨利·高尔兹~~)那样的左翼有着紧密历史联系的 ~~1970年代~~ 的作者有关的“跟无产者再见”的论点,或是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赖斯·霍布斯鲍姆~~)和克劳斯·奥夫(~~悦基诺·奥夫~~)相关联的、不那么激烈的工人阶级边缘化的政策陈述。实际上,工人阶级斗争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可能高涨,而且已经出现了有争议的高涨。例如,我们可考察一下在 ~~1970年代~~ 后期的英国和意大利或者 ~~1970年代~~ 早中期的法国、英国和德国出现的劳资斗争的情况。我们的观点是,这些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的斗争很可能是地方性的、以社区为中心(正如洛林冶金业和英格兰煤矿)或带有激进民主意识形态的源泉,而非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虽然本书不自称有系统的政治性,但它确实存在一个隐含的论点:通过工人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某种联合实现一个社会质的变化,这必须基于对立的政治文化发展的转变,其体现者并不一定为改良主义者,因而我们至少要把这里隐含的政治同当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以及通常为还原主义的阶级政治相区分。虽然我们反对在更宽的框架中解释“后工业”,但我们认为这些解释揭示了当代社会关键方面的一些重要真理。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在对新马克思主义广义思潮十分支